

人口变迁和语言演化的关系

周振鹤 游汝杰

本文从九个方面对人口变迁和语言演化的关系进行了考察，指出：历史上的人口变迁是语言演化的主要原因之一。移民引起方言的消亡、更替、融合、并用等变化。语言演化的种种不同形态，跟移民数量的多寡、迁徙过程的久暂、迁徙距离的远近，以及移民和土著的文化背景等有关。

作者：周振鹤，1941年生，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游汝杰，1941年生，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语言学硕士。

语言的发展和演化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考察。宏观的演化大致包括语言的分化、融合和更替；微观的演化是指一种语言或方言中某些语音读音的变化、词汇的增减、语法结构的变化等等。

语言演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人口变迁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宏观演化的原因来说，人口变迁尤为重要。人口的大规模迁徙往往引起语言的分化。本来同操一种语言的人群，聚居在一起，同属一个大社团，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四散移居，分化成若干不同的社团。社团的分化往往引起语言的分化。语言分化的结果是产生方言或次方言。如果移民的语言和当地土著的语言互相渗透和融合，那么就可能产生混杂语。移民语言和土著语言互相接触之后可能产生的另一个后果是：其中一种语言取代另一种语言，这一后果造成语言的消亡。还有一种情况是比较特殊的，那就是移民语言和土著语言并存竞争，造成双语现象。

然而，这仅仅是人口变迁和语言演化的大略关系，而实际上由于移民数量的多寡、迁徙过程的长短、迁徙距离的远近、新居地和原居地联络的疏密、移民和土著文化的高下等等因素，这二者的关系还要复杂得多。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和人口流动相当频繁，语言和方言的种类非常多，因此人口变迁和语言演化的关系就更加复杂。本文以中国境内的移民和语言材料为基础，将二者的关系归纳成九个方面加以讨论，着眼于语言的宏观变化。

（一）移民带来的方言取代土著方言

如果外来的移民在人数上大大超过土著，并且又占有较优越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

同时迁徙的时间又相对集中,那么移民所带来的方言就有可能取代土著的方言。

最典型的例子是西晋永嘉丧乱后,北方移民的方言取代了江南宁镇地区原有的吴方言。西晋之前,宁镇地区属纯粹的吴语区。留传至今的南朝乐府民歌中有一类题名为“吴声歌曲”,也就是当时用吴方言传唱的民间歌谣。不过文人采录时多用当时的书面语,所以流传至今的吴声歌曲除了个别方言词(如人称代词“侬”)以外,几无方言特点。

《晋书·乐志》说:“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吴声歌曲既然是产生于建业(今南京),那么当地的方言必然是吴语。至于吴声歌曲产生的年代,据《晋书·乐志》说:“吴歌杂曲,并出江南。东晋已来稍有增广。”可见东晋以前已经产生,东晋以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流传。民间的吴歌应该是很早就有的。《世说新语·排调篇》载:“晋武帝问孙皓,闻南人好作尔汝歌,颇能为不?皓正饭酒,因奉觞劝帝而言曰:‘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万寿春。’帝悔之。”晋武帝时已流传到北方上层社会,可见起源还要早得多。所以在永嘉丧乱之前宁镇地区使用吴方言是没有疑问的。

但是在永嘉丧乱之后,大批移民,主要来自苏北和山东,南渡进入建康地区。东晋先后在该地区设置的侨郡、侨州多达二十多个。移民的人口估计在百万之上,超过了土著。并且移民之中有不少是大族,如跟晋元帝司马睿一道从琅琊(今山东临沂一带)来的千余家,其中大族就占上百家。这些大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水平方面自然超过土著。《颜氏家训·音辞篇》说:“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这是说南方的土族说北方话,庶人说吴语,所以“数言可辨”;而北方的官民都使用北方话,所以“终日难分”。可见在南朝做官的是说北方话的北方人。

由于北来移民在人口、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优势,北方话就取代了吴语。但是这个取代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一则因为操吴语的土著毕竟还占一定的比重,所以南下的官吏交接庶人不得不用吴语。那时候“接土族用北方话,接庶人用吴语”,可能还是通例;二则南下的土族为了调和跟当地土族的矛盾,不得不采取妥协政策,在语言方面,不能完全排斥,也跟着学一点吴语。《世说新语》中有一段话:“恒玄问羊孚,何以共重吴声?羊曰,以其妖而浮。”对这句话中的“吴声”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指“吴方音”;二是指“吴声歌曲”。从后文“妖而浮”来看,指“吴声歌曲”可能性大。不管何所指,可以肯定的是当时上层阶级对吴语和吴文化是重视的。

所谓土族是包括读书人的,南渡的书生对江东方言和北方话的严重差异一定非常敏感,所以郭璞(山西闻喜人)大约在侨寓江东时所作的《尔雅》和《方言注》称举最多的方言地点即是“江东”(两书共一百七十处)。他们为了跟当地书生接触想来也要学些吴语。而那些南下的官吏出于接待庶人的需要,至少也得学会听懂吴语。看来北方话在宁镇地区开始的时候只是占上风,经过几个世代的更迭才完全取代了吴语。

(二)移民放弃旧地方言改用新地方言

如果新来的移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地位远逊于土著,人口相对较少或分散而处于土著的包围之中,那么移民就可能不得不放弃旧地的方言,逐渐改用新地的方言。

中国的五十几个民族中完全不再使用本民族语言而改用汉语的,只有回族和满族,有的著作把畬族也列在其中。畬族集中分布于闽东北宁德地区十一个县;浙南温州、丽水、金华

三地区的十多个县；另有少部分分布于赣东、皖南、粤东，各几千人。据初步了解，除了粤东的惠东、海丰、增城、博罗诸县的一千多畲族使用苗语的一种方言之外，其余三、四十万畲族完全使用汉语客家方言。不过他们所说的客家方言跟粤东的梅县、闽西的长汀、闽北的邵武所使用的客家方言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各畲族所说的客家方言彼此间都比较接近。例如闽东十一个县的畲族相互通话没有困难^①。

除了广东博罗等四县的畲话应是苗瑶语族苗语的一种方言以外，大部分地区的畲族所说的话应归属于汉语客家方言的一个次方言。浙南的畲族不仅语言已改用客家话，甚至还有改用汉姓的，如刘、林、李、胡、丘、罗等。一般说来同一个民族使用同一种语言，为什么畲族说两种语言呢？并且大部分不用本族语而用汉语的一种方言呢？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大部分地区的畲族历史上也是说苗语的。在今天畲族说的客家方言中有一些明显不是客家方言的词汇，它们的语音形式却跟苗瑶语接近，如“蜈蚣、肉、杀、母”等。又据《潮州府志》载，当地畲民把“火”叫做“桃花溜溜”，把“饭”叫做“拐火农”，今博罗一带称“火”为 [tho]，称“饭”为 [kwe]。这说明现在已改说客家话的潮州畲民，当时是说今博罗一带的畲语的。此外还有些民族学上的材料也可以作为它们历史上可能使用苗瑶语的证据。如浙江《景宁县志》在讲到畲民时称：“其风俗仿佛若两广苗民。”所谓风俗大约包括对歌恋爱、祭祀祖宗盘瓠等。在增城、博罗的畲族至今还被当地的汉人称为山瑶。

那么畲族什么时候，为什么改说客家话呢？关于这个问题并没有详尽的文献可供直接参考。今天各地的畲族都说他们的故土在广东凤凰山。从现代广东部分畲族还说苗语来看，这个传说是可信的。他们迁入福建当在南宋之前。写于南宋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三说：“凡溪洞种类不一，曰蛮、曰瑶、曰黎、曰蜒，在漳者曰畲。”“漳”指福建漳州。浙江的畲族是从福建辗转而来的。迁入的最早年代有文献可以查考的是在明朝开国初年。清代《宣平钟氏家谱新序》载：“大明洪武乙卯，日章公由福建迁处州景宁。”明代自闽入浙的畲民大约先是集中在处州，后再向浙东南、江西、皖南迁徙，他们明显是从福建迁来，而不是直接由广东迁来的。丽水（即处州）的畲民称当地汉人为“明家人”，汉人则称畲民为“畲客”、“畲客婆”或“客家”。这也说明畲民成批入处州最早当在明代。后来陆续而至的亦复不少，最集中的时期大约是在明末清初。清代中叶之后浙南地区想必已充分开发不能再容移民，所以畲民入浙也渐渐中止了。

古代浙江境内并没有客家人。现代的闽西却有客家人的地盘。畲族改说客家话当在移入福建之后，转来浙江之前。跟别的少数民族比较而言，畲族并没有形成一个或若干个大的聚居区，他们的自然村最多不过几十户，最少的只有二、三户，并且是星散在汉族村落之中。在他们人口最集中的县份也不过占全县人口的5%左右。

客家人是在唐末至宋初移入闽西的，这些从先进的中原地区南移的客家人在经济和文化及人口数量方面都占压倒优势，所以畲族改说客家话。在明初移入浙南之前，他们的语言已经完成了转变的全过程。在客家移入闽西、粤东以后，畲客的纠纷和语言接触是很频繁的，这从一些族谱中每每可以看出。

在完成语言转变前可能有使用双语的过程，粤东的一千多畲民至今仍处在这个过程中。这些畲民只是在畲族村寨或在外地与本族人相遇时才用苗语，在与汉人交往时也会说汉语。

(三) 移民的旧地方言和新地方言相融合

在移民和土著在人数、文化、经济等因素综合力量大致均衡的情况下,如移民和土著杂居在一起,交往又很频繁,那么他们的语言有可能互相融合,而不是一个被另一个所取代。

今吴语区北部有一个所谓“半官话”小区域,它的四周被纯粹的吴语所包围,这就是杭州话。它的分布地域很有限,大致略大于杭州城区的范围。在吴方言中杭州话是很有特色的。

在语音结构上,它可以说道地的吴语;保留全浊声母,塞音和塞擦音有三级分法;声调有七类,保留入声,并且带喉塞尾[?];鼻韵尾只有一套,“因、音、英”三字同音;古咸、山两摄韵尾失落,如三、南、船三字读音均是开尾韵。这些都是官话完全没有的特点。

但是它却缺少文白异读系统。许多字在吴语中普遍有文白两读,但是在杭州话中只有一读,这一点与吴语不同而与北方话一致。例如以下四对词中加着重点的字,在苏州有文白两读,在杭州只有一读:人家/人^人民;问^问路/问^问题;生^生日/生^生产;日^日班/日^日本。

从词汇方面来看,杭州话里有许多词跟官话一致,而跟周围的吴语完全不同。最典型的是杭州话里的人称代词、结构助词和否定副词的系统跟官话完全一致。然而也有些词汇跟官话完全不同,而是属于吴语系统的,如落雨、困觉、番薯、事体、今朝等。

杭州话既有北方话特征又有吴语特征,在各地吴语中杭州话听起来是最象普通话的,怪不得有人把它称作“半官话”。杭州话的“半官话”性质显然跟历史上宋室南迁时的大批北方移民有关。关于这些北方移民在人数上与原有土著的比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说:“切见临安府(即北宋杭州)自累经兵火之后,户口所存,裁十二、三,而西北人以驻骅之地,辐辏骈集,数倍土著。”由于临安成为南宋首都(正式名称虽然是行在所),所以北方居民集中此地,以至人口比原住居民多上几倍,这当然要使杭州原有语言发生变化。北来移民主要只是集中在杭州城里,并不是分布在临安府的所有七个属县之中。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得到证明:一是至少从北宋政和年间到南宋嘉定年间前后一百年中,杭州(南宋时改称临安府)一直是领有七个属县,县数并不增加。试比较晋永嘉丧乱后宁镇地区为安置移民新增二十多县,可以看出南宋临安府的府城以外地区并没有什么移民,即使有,也是微不足道的;二是现代的杭州方言也只限于市区范围,一出市区即是纯粹的吴语,这可以跟宁镇地区方言大面积更迭相比较。如果府城以外地区也有许多移民,那么现代方言地理格局势必会类似于宁镇地区。所以临安府城内移民的比重如《要录》所言:是“数倍土著”。移民的成分除了皇室以外,还有数以万计的大官僚、大商人、大地主,以及大批的僧侣和一般百姓。所以移民和土著的语言是在多阶层中发生接触和交融,这样的背景是有助于语言的融合的。

杭州方言形成的历史背景大致如此。从语言学角度来看,有一点颇堪注意,即一般认为语言中最稳定的部分——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的变化。代词系统是属于所谓“基本词汇”的,而杭州话恰恰是整个代词系统换成官话型了。还有些口头很常用的基本词都不再用固有的白读音或干脆换用官话词汇。而最稳定未变的是语音结构。其中的原因可能是这样的,当时土著的语言心理是想学会政治地位较高的官话,而那些北来的大官僚和大商人所说的官话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即是一些基本词汇。土著对这些词最敏感,也最容易学会。另一方面操官话的阶层为了跟吴语阶层交际,也不得不迁就吴语。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带有混合语性质的杭州话。

(四) 移民远距离转移后仍保持其固有方言

移民远离原居地来到新地后,仍然聚居在一起,如果他们原有的文化传统和新地土著的文化特点格格不入,语言也大相径庭,那么移民就有可能保持原有的语言或方言。不过年深日久,加上联络渐减,新地和旧地的方言也会发生分化。如果新地和旧地方言至今仍然面貌相似,那么至少要具备下述条件之一:一是移民的历史不太长;二是移民和旧地的联系连续未断。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新疆的锡伯语国外有的学者认为是满语的一种方言,但是国内一般的看法是属于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的一种语言。它在许多方面跟满语很接近。在满人入关之前,满语只使用于东北地区。为什么跟东北相隔千山万水的新疆会有一种跟满语相近的语言存在呢?

原来锡伯人的故土本是东北的嫩江流域,今天在辽宁、吉林、黑龙江的一些地方也还有他们的同胞。锡伯语和满语相近是自有其历史渊源的。锡伯族的祖先是室韦,满族的祖先是靺鞨。《唐会要》说:“室韦言语和靺鞨相通。”据《北史·室韦传》记载,酋长称为“莫弗”或“莫何弗”。在后来的满语中“老翁”、“长老”称为 mafa,音与“莫弗”相近^②。

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平定准噶尔及大小和卓木之乱以后,在伊犁建立了将军衙门,为了充实兵力,将锡伯族官兵,包括家属及跟随而来的闲散人员共五千多人迁到新疆。这些人在那儿屯田,蕃衍,经过二百多年形成现代新疆锡伯族。他们居住的地方比较集中,邻近地区是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地,经济和文化与之彼此不相上下,所以他们的语言也就保留下来了。相反东北故土的锡伯族人却不再用本族语而改说汉语了。

移民引起方言的大转移在汉族内部也不难找到例子。如闽南方言远播海南岛,客家话迁至台湾岛。甚至在美国还有几十万华裔说广州话,因为他们的祖宗多是广州一带的农民。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大批中国劳工东渡美国加州开采金矿时,广州话也就转移到太平洋彼岸。

(五)移民带来的方言在新居地演化成一种新方言

移民带来的方言在新地扎根后,如果与原居地的方言隔离,演变较慢,较为保守,留在原居地的方言反而发展较快,那么,久而久之新、旧两地的方言会演变成两种差异较大的方言。

现代长江以南有一百个以上的县住有客家人。“客家”这个名词是十七世纪才出现的,以前的地方志没有提到这个名词。在后来的文献中不仅出现“客家”,并且常常是“土客”并提。“客家”显然不是土著,他们是历代从北方南下的移民。据今人罗香林的考证,客家南徙共分五期。其中只有前两期是直接由北方迁到南方的,即第一期于东晋至隋唐从山西和河南迁至长江南北岸;第二期于唐末至宋从河南、皖北渡江入赣,更徙闽南、粤北。后三期都是前二期已经在南方落户的客家再次向南方别地转移。最近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客家人退居到闽粤赣交界地区,发展自己的社会、文化特点的时代要晚至宋元之交,甚至更晚些时候。我们认为从客家方言所保留的特点看,客家人大规模南下应该在唐中期至宋初,接近于罗香林所说的第二期。唐中期安史之乱引起许多北方人南下,这一点为罗香林和其他史家所忽略。

现代客家方言分布范围很广,也很分散,但是却相当一致。客家方言的集中地区是粤东、赣南和闽西,梅县方言一向被当作客家方言的代表。

客家的先民大多来自中州。我们拿今天的梅县方言和宋代汴洛方言相对照,有以下几点重要的相同之点:1,见组和精组不混;2,疑母读后鼻音;3,浊塞音已经清化;4,鼻韵尾有三套;5,有入声,并且有收-p尾的;6,浊上声已归去声。除了第3点以外,这些相同之

处都是现代的开封音所没有的。比较重要的不同只有三点：一是客家话没有撮口呼，而宋代汴洛四呼俱全。客家的撮口呼可能是南迁以后拼入齐齿呼的。这种演变的趋势在别的方言里也可以观察到，如浙江湖州方言没有撮口呼，这显然是后来发展的结果。二是客家话入声有 -p、-t、-k 三种收音，宋代汴洛只收 -p 或一种所谓“促音”。这可能是构拟方面的问题。一般说来促音尾不可能是后来增生的。三是歌韵读 [o]，汴洛读 [a]，从 [a] 变为 [o]，这也合乎一般的规律。

如果将客家方言跟更早一些的中州音比较，那么至少在浊塞音和浊上归去这两点上不能相合。如果将它与元代周德清所著《中原音韵》比较，那么至少在后鼻音声母、收 -p 尾和入声这三点上不能相合^③。

所以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客家人的大规模南迁应在切韵产生之后，《中原音韵》产生之前。

(六) 移民造成民族错居并引起方言的更替

我国西南苗、瑶、壮、侗等族历史上多迁徙之举，迁定以后，又多与他族错居，语言也因此有相互更替的现象，亦即放弃本民族语言，而改用他民族语言。但是这种情况并非放弃整个民族语言，象上述的畲族一样，而只是某个族系放弃其使用的方言，而采用他族语言。

广西金秀的茶山瑶不说瑶语，而使用一种跟壮侗语族接近的语言。茶山瑶的人口据1982年的统计有8,586人，占瑶族总人口10%弱。“茶山瑶”是汉人对他们的称呼，他们自称“拉珈”，“拉”是“人”的意思，“珈”是“山”的意思，他们说的话叫“拉珈话”。茶山瑶居住的广西金秀县是瑶族最大的聚居区，共有瑶族三万多人，其中除了茶山瑶之外，还有盘瑶、山子瑶、坳瑶和花兰瑶。后四个族系都是说苗瑶语的，唯独拉珈话跟壮侗语言相近。所以茶山瑶跟盘瑶的语言差别很大，竟至不能通话。拉珈话的声母系统中有缩气塞音，如天 [ʔbon]、胆量 [ʔblai]。这正是壮侗语言的特点。

有人认为拉珈话跟壮侗语族的侗水语更接近。但全秀一带并没有侗族或水族。据茶山瑶本民族的传说，他们主要是从广东迁来的，很可能他们还在广东老家跟当地侗水族杂居的时候，就放弃本族语了。金秀瑶族五个族系中最小的是花兰瑶，只有一千多人，他们的语言则接近苗语支。传说他们是从贵州迁来的。他们放弃瑶语也可能是早在贵州的时候。

瑶族中第二大族系是“布努”，共有十五余万人，分布在广西的都安、巴马等十六个县和云南的富宁，他们说的话不是瑶语，而更接近苗语。他们究竟什么时候改说苗语的，还不清楚。据1957年的统计，使用苗语支语言的瑶族占瑶族总人口的34.84%。

因移民而引起语言更替的例子还有不少，如湖南通道、贵州黎平、广西三江有几千苗人说侗语，同瑶族、苗族、黎族、壮族等民族都有部分人改说汉语。我们还没有在西南地区找到语言融合的典型例子，看来在民族杂居地区语言的更替比语言的融合更为普遍。

(七) 移民引起毗邻地区方言发生不同程度的质变

甲、乙两个相邻的方言区，如果甲区的经济、文化较发达，而人口又几近饱和，乙区则相反，那么甲区就有可能向乙区移民。往往起初是占据边界地带，后来才慢慢地深入到腹地。甲区的方言特点也因此渗入乙区，而使乙区方言发生程度不等的质变。

汉代扬雄《方言》屡次将“南楚江湘”相提并论。“南楚江湘”的地域大致相当于今湖南全

省。古代湖南应该是使用同一种方言——湘语的。但是到了现代，湖南境内的方言却有好几种。这是历代受邻省方言侵蚀的结果。其中又以江西方言影响最大。

今天湘东的平江、浏阳、醴陵、衡山、攸县、茶陵、耒阳、常宁、酃县、桂东、汝城等县的方言具有明显的赣语特征，最显著的是古全浊声母都是读送气清音[th]，如果用长沙话读，则是不送气的[t]。尤其是平江话，赣语的特征更明显，如入声字保留塞音韵尾-t，古泥来两母在洪音前泥母读作[l]，在细音前泥母读[l^h]，来母读[l]。这两条特征与赣语相同，而为湖南其他地点的方言所无。

往西到湖南中部腹地，赣语的特征相对减弱。再往西，在湘西地区赣语影响虽有但已很微弱。

湖南的赣语地盘和赣语影响是历代大量接受江西移民的结果。江西移民所使用的方言，对湖南固有方言产生程度不等的冲击。两者之间发生取代、融合、混杂等变化，变化的情况跟移民的数量、年代和迁徙的路线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国古代历史文献向来缺少完整、系统的移民材料，利用地方志中的民族志可以从侧面了解移民的情形。氏族志以谱牒为据，记载各氏族的原驻地及其迁入的原因和年代，事实上是相当可靠的移民材料。湖南省含有氏族志的地方志有：清道光《宝庆府志》、光绪《邵阳乡土志》、《武冈乡土志》、《湘阴县图志》、《永定县志》、《靖州乡土志》及民国《汝城县志》。这七种地方志所及地域占全省面积的六分之一以上，在地理分布上及于省境的东北、中部、东南、西北和西南，五个方位俱全。就研究移民情况而言，颇可代表全省的大势。

分析、归纳上述方志中氏族志的材料，可以看出外地向湖南移民的主要特点有五个：1，江西移民占大多数；2，江西移民自东向西逐渐减少；3，江西移民的来源地（出发地）十分集中；4，湘北的移民多来自赣北，湘南的移民多来自赣中；5，江西移民自唐末五代始，及两宋元代颇具规模，至明代而大盛。

从五代至明末长达七个多世纪中，江西地区持续不断地向湖南实行大量移民，即使是僻远县份也有江西人的足迹，而与江西结邻的县份则有尽为江西人占据的。这种情况自然使湖南方言发生深刻的变化，不但在湘赣边界形成明显的赣语区，而且赣语特征显著的县份自东北深入西南，自湘阴而宁乡，而新化，而绥宁，直达湖南之僻壤。在江西方言的普遍影响中各地又有深浅的不同。一般而言是距江西越远，影响越弱。邻近江西北部和中部的县份是赣语区的核心，尤其是平、浏、醴诸县方言赣语特征更为明显，这些县份的居民绝大多数是江西移民的后代。赣语区南部因移民数量稍逊，赣语特征与老湘语或新湘语特征遂成并立之势，汝城就是如此。赣语区以外湘阴、新化的江西移民分别达到外来移民总数的72%和75%，故赣语影响才能与新（老）湘语相匹敌。更向远处，永定和靖县江西移民在40%以下，赣语特征已成强弩之末，影响甚微了。

通过对江西移民和湖南的赣语区形成的关系的分析，还可以得出这样一个一般性的结论：如果移民要对新居地的固有方言产生深刻影响，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数量大，二是迁徙时间集中。固有方言的继承性一般都相当顽强，不在短时间内以压倒优势的移民语言去侵蚀它，同化它，就很难改变它固有的结构。上述湘阴、新化二县就是明显的例子。两县的江西移民分别为移民总数的72%和75%，而赣语特征仅能与新（老）湘语相颉颃，远不能取而代之。

之。这样看来,益阳、宁乡、绥宁诸县虽然没有移民材料,也可以推知其江西移民至少占移民总数的四分之三左右。而平、浏、醴诸县居民则必然十九是从江西迁入的。不但如此,新化移民迁入的时代主要集中在北宋,尤其是宋神宗熙宁、元丰间。新化本“梅山蛮”所居,宋神宗时“平蛮”置县,招徕汉民垦殖,江西移民遂大量涌入。湘阴的移民则集中在五代和明代,尤其是五代,仅后唐同光年间就移入十八族。如果移民只是在长时间内断断续续地移入的,那么移民方言就会慢慢地被固有方言所同化,而不能留下值得一提的影响。靖州的江西移民本仅占移民总数的35%,而移入的时间又相当分散,南宋五族,元代三族,明代六族,稀稀拉拉的,形不成一股势力,江西方言也就没有留下什么影响了。

(八)移民的方言冲淡了土著方言的特征

移民带来的方言有时并不完全取代新地方言,而只是不同程度地冲刷、消磨新地方言的特征。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旧地方言特征在地理分布上的萎缩,二是这些特征本身在程度上的减弱。

皖南的铜陵和太平一带的方言原来完全是吴语系统的,就是到今天还保留全浊声母。但是由于近几十年来受移民带来的官话的影响,它的词汇都变成官话系统的了。浙南平阳蛮话的情况也如此,它保留全浊声母这一点跟属于吴语的温州方言一样,但是它有许多闽语词汇。还有些语法特点也带闽语特征。如小称词尾用“团”不用“儿”。男孩是“丈夫团”,女孩是“作母团”。《集韵》说:“团,闽人呼儿曰团。”平阳蛮话中的闽语成分显然是入浙的福建移民带来的。

吴语和官话的分界线有一段是穿过苏南的溧水县的。溧水县城在抗战时因为日军狂轰滥炸,人口剧减,其后有相当数量的操江淮官话的居民移入,因此现在的县城方言完全是江淮官话系统。县城东南的几个乡也由于官话居民的不断移入,冲淡了原有的吴语特征。塞音虽然保持三级分法,但是全浊音的浊度跟苏沪一带吴语比较,却有不同程度的减弱。有的字本来应该读浊音的,甚至已经变读清擦音了。如“败”字不读[bai],而读[fe];“步”字不读[bu],而读[fu]。

苏北和其他官话区的人不断地向苏南和上海地区移民,特别是苏北移民一直深入到钱塘江北岸,他们带来的官话对某些苏南吴语产生影响。例如吴语和官话临界地带的浊音趋向清化,除了上述溧水外,还有丹阳,文读时已经没有浊音,只是白读时还保留浊音。高淳话中浊塞擦音已经消失。常州地区的某些词汇脱离了吴语系统,归入了官话系统,如“他、穿(衣)、锅子、家里”,这些词在一般吴语里是“渠、着(衣)、镬子、屋里”。

(九)移民的双语现象

到达新地的移民如果在人数上只占少数,在经济、文化上的地位又相对较低,那么他们不得不学会新地的方言;但是由于他们往往是大分散小聚居,以便于保留旧地的风俗习惯和在新地的生存发展,所以他们在自己的家庭和移民的社区里仍然是使用旧地方言的。这样就产生移民的双语现象。

今天苏南吴语的许多县,特别是太湖以西的,有许多祖籍是河南、湖北等地的居民。他们被称为“客民”或“客边人”。他们的人口总数没有统计过。大致是丘陵地带人烟稀少,较穷,客民就多些,平地富裕地区客民少些,甚至没有。这些客民大多是大分散小聚居的。他们是

太平天国战争后迁入的,虽然已经繁衍了好几代,但是一直到他们的父辈时代还保留河南或湖北的年节和婚丧的风俗。在与当地人交际时,他们说的是道地的当地话,但是他们自己互相谈话时,却说“客边话”。也有人把他们所说的话叫做“棚子话”的,这是因为他们初来时只能搭建一些临时的棚子栖生。“客边话”大约是受当地吴语的影响,长期以来又跟原居地方言没有什么联系,所以跟北方话已有所不同。例如溧水县共和乡的“客边话”其语音系统,从总体上看是属于官话系统的,但是有些入声字却读成带喉塞尾,读法跟吴语相仿。

在民族杂居地方,居民操双语是相当普遍的,最典型的是瑶族。瑶族多是与其他民族杂居的,他们没有本族单独的市场,墟场多是与它民族共同组成的,为了日常生活和交际的需要,他们一到成年都能说一种或更多别族的语言或方言。青海省贵德县有一种双语现象很特殊,当地的藏族人和汉人交谈时,在同一句话中既有汉语成分,又有藏语成分,有点一边说话一边自己当翻译的味道。青海人把这种现象叫做“风搅雪”。

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双语制不能长期维持,最终要发展成单语制。双语制最后的也是最坚强的堡垒是家庭。但是如果因婚配关系引进了新地的方言或语言,那么双语制在这个家庭里很快就会崩溃。另一种情况是下一代不再愿意说父母的家乡话,虽然他们听得懂。到了第二代双语制也就结束了。许多移居汉族城市的少数民族家庭都有这种情况。必须有下述的特殊原因,双语制才能长期维持。一是移民聚居自成社团;二是移民有较强的“族系”意识,有意识地保持原有的文化传统。例如苏南的河南移民的双语制已经维持百年而未衰,其原因就是他们为了在新地能够生存下去,必须聚居在一起,还必须保持内聚力,以抵抗土著居民的地方主义和排外倾向。海外华侨,尤其是在东南亚,为了保持中国的文化传统,则是有意地维持双语制。据1972年的统计,新加坡的华裔有91.1%的人使用闽南话,其中有45.8%的人兼用马来语,41.2%的人兼用英语。

人口变迁和语言演化的关系似乎是显而易见的,西方的语言学家在上个世纪后半期以印欧语言为基础建立了语言分化的“谱系树说”。这个理论认为原始印欧人的迁徙引起原始印欧语分化为各别的语族,各语族居民再次迁徙引起语言的再分化,现代各种印欧语言就是原始印欧语一再分化而最后形成的。这种分化的过程好象树干分叉为树枝,树枝再分叉为更细的枝条,所以被称为语言的谱系树分化。这一理论是受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启发而产生的。其实语言的演化并不象生物进化那样脉络清楚。从本文上述论述来看,人口变迁和语言演化的关系比“谱系树说”的假设要复杂得多。本文只是从人口变迁的角度讨论语言的演化,实际上语言的演化还跟行政地理、政治地理、经济地理、山川形势等多种因素有关,这就需要另作专题讨论了。

(本文责任编辑:张家哲)

注:

①关于闽东畲语详见罗美珍《畲族所说的客家话》,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关于粤东畲族语详见毛宗武、蒙朝古《博罗畲语概述》,载《民族语文》1982年第1期。

②关于锡伯族跟室韦的关系,详见赵层《锡伯族原考》,载《中央民族学术论文集》(历史学),1980年。

③宋代汴洛语音参见周祖模《问学集》下册,中华书局版,第581—655页。